

沙俄利用东正教侵华史话



LISHI ZHISHI DUWU

中 华 书 局

K25/18

历史知识读物

# 沙俄利用东正教侵华史话

黄心川 张伟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40027

中 华 书 局

1979年·北京



740027

历史知识读物  
**沙俄利用东正教侵华史话**  
黄心川 张伟达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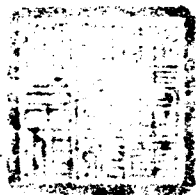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咸 宁 地 区 印 刷 厂 印 刷

\*

787×1092 毫米 1/32·1<sup>1</sup>/<sub>2</sub>。印张·22 千字  
1979 年 5 月第 1 版 1979 年 5 月湖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册  
统一书号, 11018·761 定价, 0.11 元

## 目 录

- 一 东正教的由来 .....1
- 二 俄国东正教侵华的前前后后 .....3
- 三 俄国东正教侵华的累累罪行.....13
  - 打入中国心脏的间谍和坐探.....13
  - 沙俄武装侵华的谋士和帮凶.....25
  - 披着“学者”外衣的文化特务.....33
  - 一群无恶不作的“罗刹”.....36
  - 白匪和日寇的反共工具.....39
- 四 结束语.....44



## 一 东正教的由来

东正教又称希腊正教，是基督教的三大教派之一。<sup>①</sup>基督教产生后不久，就逐渐分化为以希腊语地区为中心的东派和拉丁语地区的西派。这两个派别为争夺基督教的领导权进行了长期激烈的斗争，到 1054 年公开分裂。西部以罗马教会为中心，自称有权统辖全世界教会，故称罗马公教会（我国通称天主教会）。东部以君士坦丁堡教会为中心，标榜信奉正统教义，故称东方正教会（简称东正教会）。

十世纪中叶，东正教开始从拜占庭（即东罗马帝国）传入俄国。公元 988 年，基辅罗斯<sup>②</sup>大公符拉基米尔·斯维亚托斯拉维奇首先带领一批贵族受洗加入东正教，这是罗斯人信奉东正教的开始。由于东正教适应当时罗斯封建统治者的需要，因此它很快就在罗斯全境传播开来，成为它的国教。1453 年，土耳其攻陷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灭亡。从十五世纪到十六世

<sup>①</sup> 天主教、东正教、新教并称为基督教三大教派。新教在我国通称耶稣教。

<sup>②</sup> 东斯拉夫人居住的地方称罗斯。基辅罗斯是东斯拉夫人早期建立的封建国家。

纪,随着俄罗斯统一的封建农奴制国家的形成,俄罗斯东正教会摆脱了君士坦丁堡的管辖,成为独立的教会;并宣布莫斯科是“新的世界宗教中心”。十七世纪末,俄国东正教会的势力不断扩大,“教主之势益尊,生杀之权,上僭天主”。<sup>①</sup> 1721年,沙皇彼得一世为了从政治上控制东正教会,专门建立了一个由沙俄政府直接操纵的“东正教宗教最高会议”。这个会议的头目由沙皇直接委任,相当于沙俄政府的内阁阁员,担任神职的人员由政府发给薪金。这样,东正教会就成了沙俄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此,东正教会就完全成为沙皇专制制度对内进行欺骗、压迫,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工具。一百多年来,沙皇经常借口“保护圣地”、“保护东正教徒”和“维护信教自由”等等,对东欧和中、近东很多国家发动侵略战争。十八世纪下半叶,俄、奥、普三国第一次阴谋瓜分波兰时,沙俄就借口维护波兰境内东正教徒的“信教自由”,把大批军队开进了波兰国境。到了十九世纪初,沙俄为了取得对巴尔干半岛的霸权,又打着“保护东正教徒”的旗号,多次发动对土耳其的战争,一直把占领“东方基督教的精神中心”——君士坦丁堡作为他们进军的目标。大量历史事实表明,东正教一直是沙俄用以争夺世界霸权的一个重要工具。

<sup>①</sup> 王树枏:《彼得兴俄记》,第20页。

## 二 俄国东正教侵华的前前后后

沙俄利用东正教侵华已有二百五十多年的历史。其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715—1860年）从沙俄派出第一届北京传教士团（俄人自称“中国东正教会北京东正教总会”）来华至1860年中俄签订《北京条约》。这个时期的北京传教士团是沙俄政府派驻中国的官方代表机构，名为“教会”，实为对华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的中心。第二阶段（1860—1917年）从《北京条约》签订至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由于这个时期沙俄已向中国派驻外交公使，因此在形式上传教士团似乎变成了单纯的传教团体，而实际上，它仍受沙俄政府的严密控制，仍然是沙俄侵华的参谋本部和间谍机构。第三阶段（1917—1949年）从十月革命胜利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时期的北京传教士团，完全接受流亡的俄国东正教会塞尔维亚反动教廷<sup>①</sup>的领导，疯狂反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反对中国人

---

<sup>①</sup>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斯·卡尔洛夫纠集了以基辅都主教安东尼为首的一批逃亡神职人员和白俄头目，于1921年在塞尔维亚（南斯拉夫）成立了俄国东正教的所谓“教会最高管理处”，宣称这个管理处是俄国东正教会在国内外唯一合法的最高宗教行政机关。以后又改名“国外临时主教教会会议”。

民的革命斗争，成为白匪和日寇手中反苏、反共、反华的工具。

中俄发生宗教关系大约开始于十三世纪的元朝。那时中西交通频繁，俄国的传教士、商人、军人等不断来华。随着他们的到来，东正教也就传入了我国。

1670年，有三个希腊人，曾因航海船只受到破坏，寄寓北京，建立过东正教祈祷所。但当时这些活动，都没有在我国发生重要的影响。

十七世纪中叶，沙俄侵略魔爪开始伸向我国东北地区。1665年(康熙四年)，俄国一个流放在西伯利亚的罪犯切尔尼戈夫斯基率领一批沙俄匪徒(其中包括一名东正教士叫叶尔莫根)，武装强占了我国黑龙江中上游的雅克萨城，并在那里修筑堡寨。叶尔莫根在堡寨前面修建了一座名叫“基督复活”的教堂；1671年，他又在雅克萨城郊的“磨刀石”山上修建了另一座名叫“仁慈救世主”的修道院。这是在我国土地上最早出现的两座东正教堂。

传教士到哪里，火和剑、灾难和痛苦也就伴随着到哪里。沙俄武装匪徒强占雅克萨以后，强迫当地人民信仰东正教，并到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反抗。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前后，中国军民同仇敌忾，不断打败沙俄侵略军。在战斗过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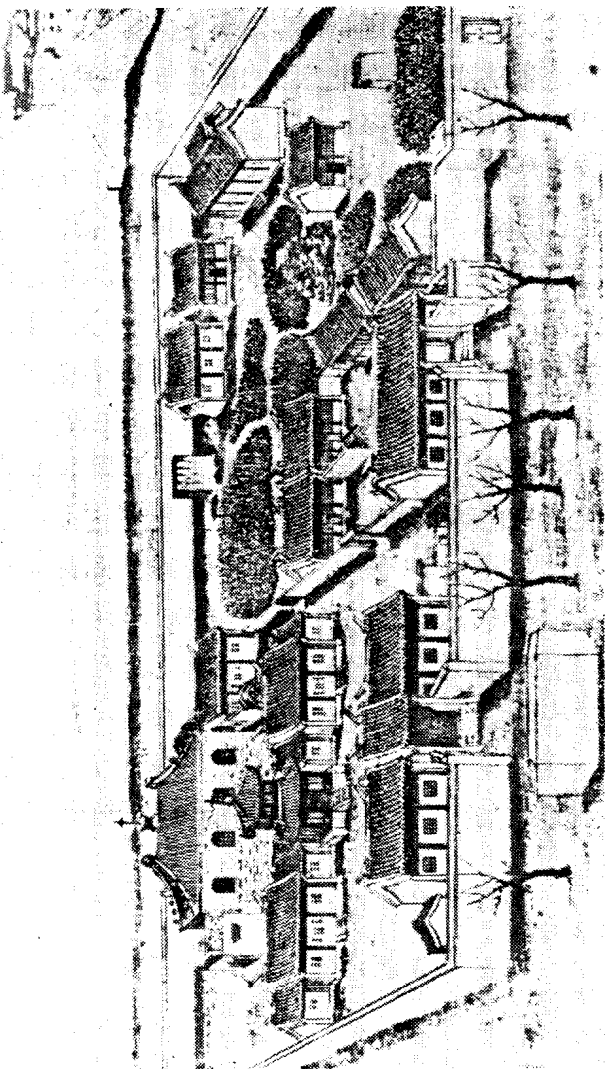
清军俘获了不少俄国哥萨克军。这些俄俘大部被遣送回国，部分被安置在北京。1683年11月清政府命令说，“罗刹归顺人颇多，应令编为一佐领，令其彼此相依，庶有资藉”。<sup>①</sup>这就是八旗的镶黄旗满洲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驻地在北京城东北角胡家圈胡同。清政府还分别赐给他们四品至七品的官衔，供给他们衣食、住房，发给薪俸，并允许与中国人通婚。为了让他们过原来的宗教生活，清政府还拨给他们一块庙地作为临时教堂。主持这个教堂的是俄国东正教修士司祭<sup>②</sup>马·列昂节夫。此人系1685年随同俄俘从雅克萨来到北京。他利用清政府的优待，经常在俄国人的中国籍妻子及其亲族中发展教徒。随着这批俄俘的归化，俄国东正教开始在北京传播。1695年，俄国西伯利亚都主教伊格那提·李姆斯基·柯萨阔夫给马·列昂节夫送来了教会证书，把他的教堂命名为“尼古拉教堂”。<sup>③</sup>这是沙俄在北京建立的第一座东正教教堂，也是沙俄利用东正教在中国打开的第一个缺口。伊格那

---

① 《清实录》，康熙朝，卷112，第18页。罗刹系当时中国人对沙俄侵略者的称呼。

② 东正教神职人员的教阶区分为：辅祭、司祭、大司祭（这三级通称为神父）。大司祭以上为主教、大主教、都主教、牧首。神职人员又分为黑白两种，白的能够结婚，但不能升为主教。教徒剪发后称为修士。

③ 中国人一般都称它为“罗刹庙”或俄罗斯“北馆”。



1695 年沙俄在北京建立的第一座东正教堂“罗刹庙”——俄罗斯“北馆”

提还指示马·列昂节夫今后不单要为沙皇祈祷，也要为中国皇帝祈祷，以便在中国找到一个可靠的立足点，诱使更多的中国人改信东正教。

马·列昂节夫在北京的活动，很快得到沙皇彼得一世的重视。1698年他亲自在一个奏折上批道：“此举甚佳。为了上帝，要干得小心一些，不要鲁莽，不要因此激怒中国官吏和已在那里筑窠多年的耶稣会教士。我们应当在那儿有一些不是过于博学，而是机智、有礼貌的战士，以免因过度骄傲而使这一神圣的事业象在日本那样遭到毁灭性的失败。”<sup>①</sup>1700年6月，彼得一世又向托波尔斯克教区发布“特谕”，要他们向中国派遣传教士团，“使中国大汗、亲信以及一般臣民参与这个神圣事业”。<sup>②</sup>从此以后，沙俄政府每次派商队来华，都配备若干“教士”随行。例如1703年萨瓦齐耶夫商队中就有九名东正教士“混迹其间”。1712年，库迪阿科夫率领沙俄国家商队来华，这时正值康熙皇帝准备派太子侍读<sup>③</sup>殷札纳等人外出访问。库迪阿科夫按

---

① 《彼得皇帝书信集》，241号第253—254页。日本事件指1639年俄国传教士被驱逐出日本。转引自帕·伊·斯卡契科夫：《俄国中国学简史》，第37页。1977年俄文版。

② 索洛维约夫：《二十九卷本俄国史》，第8分册，第95页。1962年俄文版。

③ 系较高级之翰林官。

照彼得一世的旨意，借口俄国在北京的东正教士只有季米特里一人，且已年老眼瞎，要清政府准许俄国多派几名教士来华接替，并以此作为沙俄同意殷札纳等人过境的交换条件。康熙皇帝表示同意。于是，沙俄政府就乘机挑选了一批所谓“德行高洁”的“行教番僧”，组成了第一个由沙俄政府正式委派的“北京传教士团”，于1715年5月1日与殷札纳等人同来北京。这个传教士团以修士大司祭依腊离宛为领班，包括教士和其他教会人员共十人。来华后，生活食宿费用都由清政府供给，驻地在俄罗斯“北馆”。这样，沙俄又把东正教侵华活动向前推进了一步。

1728年(雍正六年)中俄签订了《恰克图条约》。根据该约商定，俄国传教士团每十年(后改为六年)轮换一次，每届由四个神职人员和六个世俗人员组成。1732年沙俄又在北京东江米巷(后称东交民巷)修建了一座新的永久性的东正教堂——“奉献节教堂”(或称“圣玛利亚教堂”)，也就是俄罗斯“南馆”。此后沙俄传教士团来华，就都固定住在这里。这时，他们的生活费用除由清政府继续负担一部分外，其余都由沙俄政府支付。1820年以后，沙俄从国库拨给传教士团的经费，从以往每年六千五百卢布剧增至每年一万六千二百五十卢布。这样，沙俄政府不仅取得了向中国定期派遣传教

士团的权利,而且使传教士团由过去临时性的组织,变成为长驻正式的机构,从而加强了它行使外交职能的官方地位。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沙俄通过军事、外交等各种手段,强迫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霸占了我国东北、西北的大片领土,攫取了俄人可以在华自由居住和传教等各种特权。从此,沙俄东正教的侵略魔爪,就从北京逐步伸向中国各地和各个方面。

1860年中俄签订了不平等的《北京条约》,沙俄在中国设立了公使馆,传教士团改由沙俄宗教事务部管辖。表面上变成了单纯“传教”的机构。但暗地里它仍受沙俄外交部的操纵,刺探机密、搜集情报,无所不为,只是活动的方式更加隐蔽罢了。

沙俄传教士团从1715年在北京建班,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先后共换班十八次:

第一届(1715—1728年) 领班、修士大司祭依腊  
离宛·列日伊斯基

第二届(1729—1735年) 领班、修士大司祭安  
东尼·普拉特科夫斯基

第三届(1736—1743年) 领班、修士大司祭伊拉  
尼翁·特鲁索维

第四届(1744—1755年) 领班、修士大司祭格尔

瓦西伊·林切夫斯基

第五届(1755—1771年) 领班、修士大司祭安福  
罗西·尤马托夫

第六届(1771—1781年) 领班、修士大司祭尼  
古拉·慈维特

第七届(1781—1794年) 领班、修士大司祭岳阿  
基穆·石世科夫斯基

第八届(1794—1807年) 领班、修士大司祭索甫  
罗尼·格里鲍夫斯基

第九届(1807—1821年) 领班、修士大司祭亚金  
甫(俾丘林)

第十届(1821—1830年) 领班、修士大司祭彼  
得·卡缅斯基

第十一届(1830—1840年) 领班、修士司祭莫拉  
切维奇·魏若明(1830—1835年)、阿瓦库  
姆·切斯特诺伊(1835—1840年)

第十二届(1840—1849年) 领班、修士大司祭佟  
正笏(波里卡尔普)

第十三届(1850—1858年) 领班、修士大司祭巴  
拉第(卡法罗夫)

第十四届(1858—1864年) 领班、修士大司祭固里

第十五届(1865—1878年) 领班、修士大司祭巴

拉第(卡法罗夫)

第十六届(1878—1888年) 领班、修士大司祭弗拉维昂·高连茨基

第十七届(1888—1898年) 领班、修士大司祭阿姆菲洛赫·罗托维诺夫

第十八届(1898—1931年) 领班、大主教费古洛夫斯基·英诺肯提乙<sup>①</sup>

1917年以后，苏维埃政府颁行“政教分离”法令，承认东正教会为合法的宗教团体，允许教徒过正常的宗教生活；但教会和政府必须分开，教会和学校必须分开。沙俄北京传教士团却拒不接受俄国国内东正教会的领导，而甘心依附一小撮流亡在塞尔维亚的东正教反动教廷，充当它们进行反苏反共的工具。这一时期来华的传教士团共有两届，即：

第十九届(1931—1933年) 领班、大主教西蒙

第二十八届(1933—1956年) 领班、大主教魏克托尔

1956年以后，北京传教士团由中国人姚福安担任领班。

综上所述，从1715年至1860年的一百四十五年中，沙俄传教士团共换班十三次，来华神职人员计一百

---

<sup>①</sup> 参见帕·伊·斯卡契科夫：《俄国中国学简史》，附录2，第358—361页。

五十多名，发展教徒二百名左右。那时参加传教士团活动的人，大部是来华俄商、改籍中国的俄人和他们的亲属，华籍教徒较少。他们的活动范围，一般只限于北京城内外。到了十九世纪中叶、特别是1860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此以前，沙俄在华的合法传教团体只有一个北京传教士团；在此以后，沙俄在哈尔滨、天津、上海、新疆等地都建立了教堂，有的还形成了独立的教区。北京传教士团的势力也从北京一地扩至华东、华北、东北、西北各地。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16年，北京传教士团在这些地区共建教堂三十二座、分堂五座、神学院一所、男女学校二十所、气象台一座、企业和事业机关四十六处。<sup>①</sup>拥有财产一百五十万卢布。受洗的华籍教徒逐年增加。1900年以前，每年受洗的只有几十人；从1902年到1917年受洗的教徒总数增至六千人。<sup>②</sup>据1905年报刊统计，那时在蒙古和西北地区注册登记的华籍教徒已达三万七千零二十人。<sup>③</sup>由此可见，在二十世纪初，东正教已经在中国各地形成了一个严密的为沙俄侵华服务的“传教网”。可

---

① 费·英诺肯提乙：《中国的东正教会》，载《教务杂志》，1916年第10期，第684—685页。

② 马克西姆：《阿尔巴津人在北京的情况》，载《中国福音报》，1935年第3期，第16页。

③ 《东方杂志》，1905年第10期，第59页。



是今天，苏修御用“历史学家”齐赫文斯基之流却胡说什么“俄国不象英国、法国和美国那样，在中国设有传教士机构网”，<sup>①</sup>明目张胆地为老沙皇利用东正教侵华的种种罪恶活动进行辩护。这就充分暴露了新沙皇及其御用学者们为了适应其社会帝国主义扩张政策的需要，而不惜篡改、伪造历史的丑恶面目。

### 三 俄国东正教侵华的累累罪行

二百五十多年来，北京东正教传教士团作为沙俄侵华的一支别动队，在中国土地上横行不法，作恶多端，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累累罪行。现就几个方面，略作揭露如下：

#### 打入中国心脏的间谍和坐探

从彼得一世开始，俄国历代沙皇都把东正教看成是“打开中国窗户”<sup>②</sup>的重要工具。他们派遣来的一批批传教士，表面上是道貌岸然的“圣仆”，实际是一群打

<sup>①</sup> 齐赫文斯基：《中国历史学中的大汉族霸权主义》。载苏联《历史问题》，1975年第11期，第96页。

<sup>②</sup> 格列勃夫：《北京东正教传教士团的外交职能》，载《东正教之光》，第22页。1935年哈尔滨俄文版。（以下引用本文时，简称《外交职能》）